

黃榮村自傳

109 年 5 月 29 日

我 18 歲以前都住在彰化縣員林鎮，在那裏讀完小學（靜修國小）與初中及高中（省立員林中學），1965 年考入台大，修習完學士、碩士、與博士學位，我們那時員林鄉下學生，後來讀大學的不到 8%，到台北讀大學的幾乎都是第一次到台北，也是第一次進入大學校園，交往到那麼多來自國內外各地的同學，覺得這種考試真厲害，讓我們在全國各地流動，也讓我們在日後生涯產生垂直流動。這些經驗讓我因此對城鄉差距、公平正義、與垂直流動的議題特別有感覺，後來參與政府 921 重建工作與全國教育事務時，也很自然的將這些問題納入考量。

考入台大歷史系後轉心理系，必須在暑假先修完大部分理學院必修科（微積分、物理、化學、生物），在畢業之前又副修數學。後來的第二個感覺是這種轉系與副修等於是專業轉移或者跨域選修，相當於水平流動，在 50 幾年前就能做到這個地步，讓我對這類自由度如此之高的轉移與進修制度設計，深有所感，這也改變了我的日後生涯規劃。我想考試院所影響到的垂直流動與水平流動，比大學所能做到的，不惶多讓，也更為確實。

1969 年從心理系畢業，修讀碩士與博士學位，一氣呵成後

任教台大心理系，曾赴哈佛大學、Carnegie-Mellon 大學、UCLA、St. Louis 大學等處客座，歷任台大心理系教授、系主任，與台大第一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任教台大 20 餘年時間，正逢校園民主運動興起，曾協助於 1987 年解嚴前後成立台大教授聯誼會；1991 年 5 月與 10 月下旬三次主持全校大會，聲援參與反刑法一百條行動的同仁與台大校長受辱事件，並共同聯署在校務會議中通過軍警不得進入校園提案；1993 年擔任澄社社長期間，舉辦台大哲學系事件 20 周年紀念研討會，間接促成該事件之平反；1995 年擔任台大四六事件調查小組召集人，為四六事件平反。凡此種種皆係增益台大傳統學風與體現公平正義之具體作為。

校園是做學問與教學的地方，我協助 1980 年代的台大心理系，建立知覺心理學與認知科學的研究平台，培育後來學術表現卓越的人才，拿過研究優良與傑出獎項，並協辦多個國際學術會議。後來拿過一等教育獎章、台大傑出校友、中國醫藥大學（傑出）榮譽校友。當中研院評議員與歷經五屆醫療奉獻獎評審團主委，國科會（科技部）與教育部學術獎項評審主席。也替國科會與後來的科技部，召集主持過三個神經影像與認知研究中心的「心智科學研究推動委員會」，長達五年。這些比較多元的工作與貢獻，回想起來都與我過去所經歷過的垂直及水平流動還有終身學習，息息相關。

後期出任政府職務凡七年。1996 年借調國科會任人文及社會科學處處長期間，規劃與籌辦一系列科技與人文對話論壇，籌辦第一次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會議。2000 年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全職負責 921 震災災後重建工作，2001 年 7 月底以 921 重建會執行長身分擔任桃芝風災中部第五作戰區救災指揮官。2002 年轉赴教育部擔任部長，全方位辦理與因應十年教改、九年一貫課程、與大學多元入學議題，並呼應社會及學習者需求作大幅調整補強；除此之外，與大學直接相關者，則為規劃推動七所研究型大學與邁向世界一流大學計畫（後來是 12 所），推動一般大學校務評鑑，規劃設置高教評鑑中心。

離開教育部一年後，出任中國醫藥大學校長八年半。任校長期間致力於全方位調整該大學成為一所「強調大學部教育品質之研究型大學」，獲得多項國際大學評比之肯定與國內教學卓越計畫之首選，並將辦學目標再度調整為「邁向國際一流大學」。除此之外，則以四年時間（2010～2013），不間斷推動「重返史懷哲之路」的學習與實踐之旅，為亞洲首見遠赴西非史懷哲醫院，最具規模且彰顯醫學人文主軸及典範學習之學習與義診團體，2013 年並與國際同步，舉辦史懷哲非洲行醫百年紀念活動及募款。

我的一生與災難緊密相關，在 53 歲時出任政務委員全職負責

921 震災災後重建，還有桃芝風災救災。到教育部出任部長後，先是教師十萬人大遊行再是碰到 SARS，都需在第一線指揮，今日看到 COVID-19 肆虐全球，台灣防疫成效無人不稱讚，其中一個因素就是台灣的醫療與護理人員的專業與努力，這些都是大學教育、證照考試、醫院現場訓練、與終身學習的進修及認證制度所造成的，缺一不可。

這些教育學術界與政府部門的歷練，讓我深入體會到第一流領導人應該是要讓制度與組織作事，但要讓文官與幹部作事時能夠具有跨域學習，培養國際比較視野的能力與胸懷。台灣災害之後的重建很多事要靠公務員與各專業領域人員的配合，現代政府的公務治理更是要與時俱進，因此人才的教考訓用，不僅關乎政府部門，也涉及民間各行各業的專業證照取得及訓練，不同行業當然有 on-job training，但基本能力與跨域流動能力的養成、認證、及訓練，可以說是讓 on-job training 與日後實力的展現，先做好最根本的事情。我以前大部分在教與考的部份工作，因為那是大學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大學畢業前後期間的考照，也是大學重點項目。但是考照機關如何在現代化與國際化的框架中，做出有效調整是很重要的，現在的大學與專業人才培育機構，一直在資源有限下求新求變，就是為了不讓培育出來的人才與社會需求有太大

落差，考試機關在裡面就扮演了很大功能，但必須時時檢視在考試制度與做法上的調整，是否符應大學端與人才培育機構的變化，以及用人端的政府與社會之需求，並時時深入了解國際趨勢與全球人才移動的急速變化。用人端的政府與產業部門，希望進來的人才在跨域思考、國際視野、專業技能、行政效能、服務態度、與終身學習上，能在機構中一路成長與流動，依此觀點，考試院亟需思考如何與行政院及產業界合作啟動新思考，除了互相合作外，還可整合出國家級的人力資源運作機制，這是一種更主動的做法。

考試院的業務中有很多事需與其他政府部門共同合作促成更好成效的，如文官的職前與在職進修，都是培訓現代政府一流治理文官必須要做的工作，考試院有國家文官學院，有很多地方必須與行政院的訓練進修單位做好分工整合的雙贏工作。另外在年改之後，退撫基金的監理與有效經營，是公教退休人員基本福利之所繫，但以目前全球疫情肆虐下的不利經濟發展而言，退撫基金的經營相當困難，勢必產生政府如何以公務預算撥補的問題，考試院必須與行政院商量合作，才能解決國家所面臨的困難。

我過去的境遇是常需在困境中結合同仁，想出一套可以具體解決往前動，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清楚的觀點，從現代化與國際

視野、促成人才專業深入或跨域流動上，用力改革，不怕困難，只要有策略有方法，大體上都會做出一個模樣出來。這是我在多年領導下得出的心得，小如大學，大如全國教育事務，複雜如大規模天災人禍，都會有正面向上的機會，但要及時抓住一路調整改革。我想，考試院現在面對的就是要去找小、大、與複雜項目的應興應革之處，我尚不能說已經熟悉考試院的業務，所以在這些事情上也不宜太過仔細具體，不過我想從小、大、複雜觀點出發，將專業、現代化、與國際視野當為標竿，結合相關政府部門的需求而且互相合作互相幫助，一定是會有大幅改善空間的。